

文化回归 与 价值重建

周熙明 李文堂 秦 露 张宏明 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013029521

G12-53

10

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

周熙明 李文堂 秦 露 张宏明 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北航

C1638415

G12-53
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周熙明等主编.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068 - 3375 - 2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文化事业—文化发展—

中国—文集 IV. ①G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6071 号

责任编辑 / 牧 人 赵丽君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东方美迪设计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国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32

字 数 / 375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68 - 3375 - 2

定 价 / 6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2012年7月23日至7月25日，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文化回归与价值重建：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化视野”理论研讨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委党校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央党校文史部主办，厦门市委党校承办，参会人员为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文化、历史系统的专家、学者。这次会议主题的设计旨在将六中全会精神的解读从文件层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到学理层面，在党校教育系统内建立一些基本共识和问题意识。

大会除了相应的主题发言之外，还分成四个小组，围绕“传统文化与文明转型”、“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地域/城市/乡土文化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等题目开展了进一步的讨论。

这本文集收录了与会学者提交的部分论文、主题发言、小组发言及即席点评，来还原会议交流、交锋与讨论中出现的火花与亮点。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文明转型与价值重建的多重维度（代序）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周熙明）

一 什么是文明转型？

对于这次大会的主题，我认为更加根本的问题不是叫作“文化回归”，而是叫“文明转型”，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转型有各种各样的视角，比如说我们 19 世纪末的仁人志士，开始惊叹 3000 年来之最大变局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变向哪里去，只是一种深刻的焦虑，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知道 2000 多年以来从秦孝公开始改革到汉武帝近 200 年时间形成毛主席说的“百代皆行秦政制”，一种秦汉体制，到 19 世纪末完全要改变了，不可能再以这种方式来应对世界环境，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但是到底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像这样的也是在谈转型的。像梁漱溟先生，中国最后一位原儒，以一介书生这样追问，何以成中国人，何以成中国？他提出的文明转型是什么？因为我们从根本的价值理念到我们行为的方式都不可能是古典式了，那我们称自己为中国人的理由在哪里。还有 1935 年十位著名的教授提出的著名的文化宣言，至今读来依然像是在谈我们眼前的问题；1958 年那群海外新儒家谈的中国文化问题，当然学术上有推进，但是本质上的问题和“五四”时期与 1935 年是一模一样的，也在谈文明的转型。文化回归说仅是其中的一种观点，说文明转型怎么转，其中一种说法就是回归，所以我们这个主题还是读成文明

转型吧。

我们共产党人的说法和做法，尽管不直接诉诸关于文明的讨论，但是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这种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中华文明的危机。什么危机？如果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就是两千年来一直处在文明生态位最高端的中华民族在进入世界性生存时，突然掉到了文化生态位的最低端，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心理的、精神的、现实的问题。这样就必须转型，要不转型怎么解决生存问题？我们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式、意识形态的方式，实际上回应的真实问题做法本身也是文明的，只是说法不是文明的叙事。

当然，我们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提供者马克思他们，实际上他也在谈文明转型。认为 500 年开启的很有希望的人类新的文明，由于资本主义这种具体方式的障碍产生了一系列的病症，他的使命是解决这些病症，也就是要完成一种文明转型。当然，还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在谈文明转型，比如说我们的季羨林先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是在谈文明的转型。各种社会主义者，不局限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有一系列的思考，比如说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指出，苏联共产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人的缺场的严重问题，这实际上代表共产党人的人的意识的觉醒，还有南斯拉夫的 实践派，认为社会主义在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给文明带来的困境的同时，本身也走入某种困境，需要转型，这是转型当中套转型。还有一位苏联的理论家写的《让未来来审判》，其实也是在关注转型，还有《抉择》，特别能代表俄罗斯纠结想法的著作，也是在谈转型。再比如 20 世纪最伟大的活着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玩笑》、《生活在远处》等文学作品中的思考，你以为不是同样在寻求转型吗？只是他不仅仅把眼光落在社会主义的缺陷，说社会主义需要转型，他是以超越同时代的更加深邃的眼光在说整个人类生存方式亟需转型。还有写《1984》、《动物

庄园》的奥威尔，尽管带着七分的恶毒对待我们共产党人，但是他不是也在思考人类的前途问题吗？他是有深刻理念在背后支撑的，不是普通的小说家，其思考成果我们也应该吸收。当然真正的理论家，我认为思考最为深刻的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他在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主要致力于社会理论的建构，表面看来他全然是批判攻击社会主义，其实你仔细想想他也是在批判整个现代性：说社会所有的方面都是根据理性来建构，重新来规划我们的生存，难道资本主义就不是这样吗，也是这样。尽管他口号上说批社会主义，当然背后也是在关怀文明的转型。当然像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斯科特·拉什等三个人在《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书中每人以一篇长文正面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各以一篇短文相互辩驳）一书中，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全面检讨反省，这就更是在纯粹学术的理论的层面来探讨人类文明的转型。还有我们有一些著名记者写的比如说《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弯的》，《世界是湿的》，虽然很浅，但却很实在很感性很生动地在谈今天文明的转型。还有保罗·谢弗、曼纽尔·卡斯特这么一群人更是直接拿文化说事，说文化引导未来，都在谈文明转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文明转型有多种多样的视角，我们在中央党校的讲台上谈文明转型的问题时，千万不要局限于任何一个片段，尤其是不要局限于我们已经高度苍白化、板结化、教条化的宣传语言。当你用这种语言谈的时候你已经不在谈文明，是在谈文明的尸体，文明必须是活的。

好，如何理解这个会议主题，对我有一些启发的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比如说牟宗三先生的《时代使命与文化意识》，这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他说我们今天讲时代使命，只有从文化意识开始才能引起一种客观的意识，才能有普遍性、客观性。我们好好琢磨一下，牟宗三先生他这句话的意义。他里面举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圣贤，

说他们都有的文化意识，所以去担当时代使命的时候，能向孟亚圣说的一样，先立乎其大者。没有文化意识，你就把最大的最根本的魂性的东西丢掉了，你想担当时代使命、担当时代责任，只能是有口无心或有心无力。我想我们今天可能也是这样子的。

二 什么是价值重建？

至于价值的重建，我觉得我们也要有多层的视野，首先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建，用现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现代执政党有两种最基本的权力，所谓政治要有内容，这两种权力构成政治权力的内容，一种叫符号权力，构建符号。我们这种权力使用的很不到位，而别国的共产党（像苏联）在执政之后则都使用的很差，所以他们走向了覆灭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经济、社会构建的权力，这种权力我们运用得如何，现在还不好做最后的结论。总之，我们在谈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文化领导权的重建。第二是民族薪火的传递，这和回归有一定的深刻联系。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或者文明，它的内核的部分是它的价值信仰系统，这个系统越发的不好用先进落后、正确错误或者优劣高下去评价。原因在哪，说起来还挺困难的。我们说中华文明、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说我们五千年文明，一以贯之、延绵不绝，或薪火相传、香火不断。那么这里所谓的薪火、香火，指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中断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绝对不是指外围的那个工具系统，而是指最内核部分，它的价值信仰部分，它才是我们五千年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那把火。所谓弘扬传统，主要是指最内核的那个系统，它是那个虚乎乎、软绵绵、暖融融的天理、大道、道德理想、价值理想，它持续不断地牵引我们、照耀我们、温暖我们、慰藉我们，给我们以荣誉、荣耀、希望、信心、力量，至今让我们自己仰望，让别人惊异、羡慕、嫉

妒。第三，价值重建还与现代国家最深刻的合法性来源有关，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统一有关。我们不能光是陷入制度主义，操作主义，仅仅把完成自己某一时期的任务、担当某一方面的责任为使命，我们还得为某一个远处的信念、信仰负责任。我们也应该从这一方面理解我们的所谓价值重建。第四，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世界范围，文化价值重建的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的命题：在全球化的境况下，我们的价值信仰体系怎么做到既与世界通行的价值相兼容，又能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承继中华文明的香火，并为近代以来遇到障碍、没法继续发光的本民族价值信仰系统这轮精神太阳提供新的能量？第五，在百姓的视野中，所谓文化价值的重建，最紧迫最重要的是种种文化底线的重建，是天理良知的唤醒。现实社会中，种种底线，文化底线、道德底线的突破，说到底是个价值问题，是信仰体系出了问题所引起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是非善恶美丑的基本的标准没有了，什么标准都没有了，现代的、古典的都没有了，不是哪一种标准取代哪一种标准的问题，也不是不同标准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理论争论往往陷入伪命题：究竟是西方的好还是东方的好，古典的好还是现代的好？这样的争论全然言不及义，当然于事无补。现在是有和没有的区别而不是甲和乙的区别。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价值问题的严重性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面临着文化上的全面的失范与脱序，文化价值重建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建。第六，在中国近代史的视野中，文化价值重建问题，就是刚才说的梁先生问的何以成中国、何以成中国人的问题。最后是人类的视野：人类是什么？是野兽与天使的结合体，是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存在物；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形式的根本之处，在于他既生活在一个物象的功利的世界，又生活在一个想象的理想的世界。所谓文化价值的重建，实际上是要找回那个遗失或遗忘的心灵道德情感信仰的世界。

以上就是我的所谓解题吧。

总之一句话，我们读已经发表了大半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改革和文化发展的决定，要有我们的读法，不能光是止于宣传、止于一味说好、唱赞歌的读法，是这么一个意思。我相信未来党的十八大就这个问题会有更加深刻、更加完整和高远的阐述，我们大致也应该这样来读。

三 什么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创新？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给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以文化的解读。若把我们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分成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的话，那各个时期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核心的命题是什么？

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特点，我们借用毛主席引用的《红楼梦》里面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应该怎么解读？在某一种严酷的环境下，我们把它极端化就是战场上，你不开枪我开枪，整个人群分成敌和我，整个世界分成善和恶，处置方式非常简单。一直到50年代，我们虽然取得了政权，成了执政党，但我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依然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把整个社会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就这么简单。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意识形态采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思维方式，非常必要。那时必须有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思维方式，就像一位机警的战士，在敌方开枪以前我先击发了，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不容有过多的考虑。但是在常态的生活里面还能这样吗？还应该这样吗？不能！否则就会造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这就是把危机时刻常态化。今天对革命战争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所谓文化的解读，我们一方面要知道他原本没有错，不仅没有错而且对我们还很有用，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反省，带着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的眼光看待

它。如果今天依然以它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原点的话，实际的结果就是把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危机时刻常态化了。革命有它自己的逻辑，充满暴力血腥，需要人的激情和强烈意志，没有这些你别去谈革命。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怎么去看？把它看成负面的吗？不能，它并不影响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价值，我们依然要珍视它。但是，我们同时必须知道，不能让危机时刻常态化，不能让革命造反常态化。思考这一问题可以有一些其它的参照。我们可以参照我们的古人，我们常常在谈那位著名的董仲舒说的天人三策，其实他和我们今天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思考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刘邦打下天下 70 年了，老想求得天下善治而不得，董仲舒归因于没有更化；他认为，欲求善治必先更化。董要更化的就是非常态的、危机时刻的、暂时应对的理念、措施和制度。董仲舒和汉武帝两人结盟完成了这个更化，所以有了汉代几百年的天下。我们应该吸收历史的这个有效的经验。另一个参照是国外的，法国人是教训，它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克服危机时刻常态化的问题；美国人是经验，美国人在赶走英国人之后也在讨论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美国也是通过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但它不同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是，一经革命成功，就很快进入去革命化的过程：由暴力转变为和平，由非理性转变为理性，把政治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让革命的手段终止于宪法，让革命成果凝结于宪政，让革命精神成为社会共享的道德源泉。宪政一方面终结革命，同时又使革命的成果得以保存，使革命的目的部分转变为现实。不断革命也许有着良好的愿望，但结果不能不是悲剧式的，它使革命走向反面。人或曰：中国不是也有宪法吗，为何没能终止革命冲动？答：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要实行宪政，除写出来的宪法外，还得有一部写在人民心中的、作为一种政治潜能存在的、随时准备现身出场的法律：公民的美德和信仰。你去看看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就会清楚我们今天

在意识形态上该作怎样的调整了。今天也到了这个时候了，今年人民共和国成立 63 周年了，真的欲求长治久安，必先进行更化，而且是彻底的更化。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命题。

第二个命题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伟大的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简单。他老人家很低调很谦虚说自己没读多少书，说自己的马列功底不强，不厚，实际上小平同志具有宏大的历史感、宏阔的人类文明视野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是得马克思主义真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理论空间和实践道路，其重大意义不可等闲视之。令人遗憾的是，对小平同志的伟大两问的意义，至今我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位。为了创新我们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对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视野，而且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历史进程的视野；不仅应该具有中国近代史的视野，而且应该具有整个人类文明近代历史进程的视野。我们不应该局限在政治意识形态去研究政治意识形态，而应该把政治意识形态放置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视野去研究；这种研究不应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夜郎自大孤芳自赏，而应是胸襟开阔志向高远虚怀若谷海纳百川；这种研究的成果不应是一些苍白无力简单武断的宣传口号，而应该是充实丰沛学理扎实的严密理论。这样的研究，必然不排斥与众声喧哗的学界的对话，必然要大胆吸收丰富多彩的学术成果。比如说，像鲍曼这样的学者，就对社会主义有着一种非常深刻的思考：他以严密的逻辑证明，社会主义和现代主义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只是不满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说他们干的效率太差了，表现不佳，我要取而代之，来完成这个 500 年以前开始的现代性的文明运动。所以，社会主义者也和整个启蒙运动、现代性运动、资本主义犯了同一个毛病，就是造园的梦想。如果把

整个人类的生活比做一个我们的地表植被的话，现代化则不是尊重自然的植被，而是有一个造园的梦想，一切花种、树种、草种全要经过我们的评价选择。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小平同志 20 世纪末的伟大两问，实际上是和整个学界关于现代性的整体反省反思相联系的。我们说现代性和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与之不可分离的现代性，是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四种历史进程之间的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涉及到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社会的分化与进一步的细化工分，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等等这些，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你仔细想想，一旦启动市场经济的程序，不管你在社会的旗帜上写上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以上进程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共享的现代性。现代性本身有一种深刻的二律背反，所以社会主义者也会分享这种二律背反，不可以置身事外。什么二律背反？一方面朝着普遍性突进，在实际当中，又被融入了对多元主义的颂扬；一方面是对真理绝对基础的探求，企图发现一个真理的绝对基础，但是又无法得到协同，最后导致人们对无可挽救的知识相对性、相对主义的承认（要知道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是和社会主义的思考深刻联系的）；一方面是语义清晰性的梦想，我们想把什么东西都区隔、命名得非常清楚，但是结果把世界揭示为无可救药的歧义世界（尤其我们今天，一切都充满着歧义，实际上语言充满着歧义，对我们人类的命运来说，在某一个历史的片段、历史时刻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对我们致命的东西。不能排除歧义，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是这个）；一方面是我们对归属感的崇拜，但对归属感的追求最后反倒使人的无根性一览无遗（尤其我们是世俗性的信仰，共产主义曾经使我们有了归属感，但慢慢地这种归属感在越来越多的人那里变得荡然无存，从而日渐暴露了我们生存的无根性，暴露得一览无遗，我们赤裸裸地

成为无根性的存在，还不像西方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只是教会意义上的、世俗存在的那个东西死了，实际上精神上很快重建，我们这里反而没有)。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方面对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带有根本性的伟大的两问，做一个学术的扩展，通向一个文明的那种思考。

第三个命题是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接着小平同志提出的两问进行的思考，所要探索和回答的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信仰主体应该是怎样的：怎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中国共产党这个社会政治组织信奉的主义、进行的这番壮丽的事业有了疑问以后，必然要对自身进行反省。小平的两问与江泽民的两问是这么一个逻辑上的关系。那么，我们反省得够了吗？怎样建设党，建设一个怎样的党？我在这里提出来一个这样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执政党，这个都知道。可是局限于这点说法的时候带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意识如果是残缺的，你做的事业、你规划的文明一定是残缺的。中国共产党至少还有好几层的身份，什么身份？它是世界上几乎无与伦比的超大规模国家的唯一执政党、领导党。我们很多纠结是一方面拿西方的共和党、民主党，美国的标准来谈我们、要求我们，或者我们自我要求，另一方面你是个唯一执政党，是一个领导党，性质上不一样当然就谈不拢，逻辑上发生冲突。这是第二层角色身份。我们思考怎么建设党，必须扩展视野。第三，她是世界上到现在为止独一无二的完整文明的守护人。共产党从建立到一大的召开背后的诉求是什么？是保文保种。和19世纪的那些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党派，维新派、自由派或保守派，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它是这种统一文明的守护人，你就知道它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更少人知道的是，第四，实际上说到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2000多年以来的儒家精英集团的现代继承者。我们说共产主义的理想从追求社会文明发展的本质上和我们的文王周公、

孔子、孟子的文化价值理想是一致的，不要认为我们是另一个星球来的中国人，我们完全是跟他们一样。当然我们的表述上要有这个时代性质决定，我们必须要有符合时代特征时代要求的表述，此所谓质沿古意、文变今情是也。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这种文明意义上的确认，是我们价值重建的前提性问题，也是真正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所在。

第四个命题是科学发展观。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文明观或文化观（它是以一种新的价值观为灵魂的），是数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硕果。“发展”，无论是社会各层面的均衡发展，还是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文明的整体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创造和价值的引导；“以人为本”，则构成现代文化的核心或主导精神；“全面协调可持续”，既关乎到整个人类的福祉，又是任何一种健康文化的基本特征；“统筹兼顾”，无疑是任何社会文化主体为保持社会文化的健全所必须具备的智慧和必须采取的方针；科学发展中所要实施的“三大战略”，实际上可概括为“文化兴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实现了我党意识形态的突破性创新，这一点值得予以特别的强调，因为迄今它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从邓小平同志的“两问”，到江泽民同志的“两问”，再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两问”，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意识形态上与时俱进的一条清晰的线索。改革之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势不两立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是一种特殊的冷战思维、概念思维。小平同志的“两问”，是一种伟大而深刻的反思或自我反省，既冲破了过去的概念教条，开启了新的理论空间和实践道路，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从形式上说，小平同志的“两问”还是纯政治的思维。江泽民的“两问”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的组织本身的建设问题，是对邓小平的“两问”的具体化和深化，在形式上自然还是纯政治思维。胡锦涛总书记的“两问”既有政治思维，

又有一种全方位的文明思维或文化思维。换言之，科学发展观既是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又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性；既是政治理论，又是经济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既是中国经验的总结，又是世界经验的借鉴和提炼；既符合中国的现实，又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既有终极信仰和远大理想的灵魂，又有百姓生活、伦常日用的丰满血肉。发展是关乎所有人的，是和所有的阶层，所有信教（不管信什么教）和不信教的人，所有种族、民族都是高度相关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是我党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创新取得的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进一步成熟。我们知道，一个较为稳定和成熟的现代政治体系，它所提供的政治公共品通常是不带明显的政治色彩的。也就是说，执政者的一般性政策，不必直接表现出执政者的政治目的和意图。科学发展观现在也提出来很多年了，但它背后的深层次的意义迄今未被作全面充分的解读。

四 中国文化秩序重建中的真正的、真实的问题是什么？

仔细想来，我们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读书人、理论工作者，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人的角色上帝的角色。因为你是用概念、用主义来说事，而每一个概念的形成都是完成一次从有限过度到无限的危险的跳跃。什么意思？比如我们哪怕说杯子这么一个最常见的词，实际上也有巨大的风险：你见过世界上古今中外所有的杯子吗？当然没有，但是你凭什么充满自信驾轻就熟地使用杯子这个概念？但是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没法摆脱的。所以前面谈的那个好像我们在规划整个世界人类的文明，规划整个中国共产党，这实际上已把自己设想成了上帝，或者自许要承担上帝的使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人，我们不仅要知道目标在哪里，出发点在哪里，而且要知道道路在哪里。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成为社会

分工中普通人的特定角色。我们是党校教员，就像泥瓦工、电工一样，需要服从现代分工，我们不可以把自己过分的崇高化。那在这种情况下，谈下面第四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秩序重建中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我们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外力冲击的压迫，我们的政治秩序经历了一系列的巨变，学问体系，我说的文化秩序，也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经历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演化。我们如果不晓得演化的过程，我们就不能完成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自我角色定位。这100多年，维新与革命之争、文化体与用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及我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多次争论，各类思潮的兴衰，背后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何为中国现代社会正当的文化秩序？这么说吧，昨天有人在谈到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说我们在文化上面是用中西的问题掩盖了真正的古今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秩序的重建一个焦点问题是什么？人们常常以为是国学和西学的冲突，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为什么？西学本身内部也有古今的冲突，现代的西学，自然科学为重要内容，以此为基础又加上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这么一个体系才可以称之为对我们构成挑战的西学，对我们历来的文化秩序构成现实挑战的，是指这个意义上的西学，而这个意义上的西学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也解构了西方自身的古典学。我们笼统地谈中西文化的较量、中学西学的优劣，就不是有意义的真问题。我们要寻找到不同于这两者，能够在精神上重建文化秩序的一条道路。我们原来抽取现代西学在时间当中、变化当中、历史当中呈现出来的内容，将其变成和描述这个物象世界的自然科学的逻辑一样的普遍有效的东西，确定性的东西，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沃勒斯坦发现，现代西学或者西学表达的新的文明秩序，文化秩序实际上是随着西方强权国家逐渐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建立